

今日关注

非制度化生存下的“城管摊贩对跪”

□朱四倍(教师)

城管队员和摊贩居然面对面“下跪”?近日,一组照片在网上热传:一名身穿“城管执法”背心的城管队员与一名摊贩面对面跪着,旁边站满了围观的市民。截至4月14日,该组照片已被2.6万多名网友点击观看,近百名网友在帖子下留言讨论。

(4月15日《武汉晚报》)

关于城管的新闻越来越具有娱乐的效果,而身为新闻主角的城管也越来越有“娱乐了大众,苦了自己”的尴尬。本则新闻中的城管就不幸充当了这种角色:摊贩因车辆被扣下跪索要,城管与其“对跪”。城管作为执法者角色似乎消失不见了,相反有了悲情的效果。这是谁之过?谁之错?

事实上,“城管摊贩对跪”并没有换来公众的同情,而是再次引发了民众对城管的不满。正因为如此,笔者以为,作为个体,与摊贩对跪的城管值得同情,但作为执法群体中的一员,得不到同情和认同,就是被整个城管制度积弊所拖累的结果。

理论上说,设立城管制度是为了维护城市秩序,但由于制度设计上的缺陷,造成该制度功能

的扭曲,诸如以罚代管、以罚创收等现象就是明证。从本质上看,“城管摊贩对跪”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矛盾冲突的产物,还是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模式和政策的失当,也不仅仅是个体的尴尬,更是城管制度到了变革临界点的信号。只是,谁注意到了呢?

进一步说,“城管摊贩对跪”是双方非制度化生存的结果。所谓非制度化生存,就是说人们所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缺少确定性,在遭遇某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或情况的时候,不是依据明确而稳定的制度安排来解决,而是依靠一次次的具体博弈。而结果则取决于每一次具体博弈的特定后果。也就是说,非制度化生存是采取不符合国家法律、规章、政策、条例等所规定的制度和程序

的活动,在现实中,大到关乎国计民生的事情,小到个人恩怨,都有非制度化生存的事例。之所以出现“城管摊贩对跪”怪象,就是城管和摊贩都背离了法律和制度规定的线路,都是采取了反常的行为策略,由此,双方没有胜利者,有的只是闹剧。

“城管摊贩对跪”对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,最重要的就是应放弃单方面强制管理,代替以柔性管理。城管和公民之间的普遍冲突、尖锐对立,早已背离了和谐社会建设之道。一个简单的事实是,并非所有的管理行为都要采取强制的方式。行政机关面对公众的心声,应从执法理念上进行反省,进行自我约束,这是消除“城管摊贩对跪”滋生土壤,以及杜绝非制度化生存的内在要求。

媒体评说

北京晨报 奶粉抢购客遭围剿是新国耻

截至2012年底,中国婴幼儿总量达到1.08亿,家长们纷纷转向海外抢购奶粉,虽然能对西方扩大内需产生积极效应,但也由于需求短时激增对其市场造成巨大冲击,导致人家国家婴幼儿有断奶之虞。标榜自由市场的英国、德国、新西兰、澳大利亚,连自己信奉多年的价值观都不要了,接连推出极富创意的奶粉限购政策。对于举世公认的世界工厂,这是一个巨大国耻,令人无地自容。要想维护中国消费者利益,重建其对国产品牌的信心,洗刷这一震惊世界的新型国耻,首先要唤醒所有奶粉乃至食品生产加工销售企业的良知,加强行业自律,毕竟,少数害群之马的存在已经影响到整个行业的生存,该猛醒了。

晶报 凤凰古城收费,谁该转变理念

凤凰古城收费风波持续受到舆论关注。古城商户的歇业抵制和舆论的广泛质疑,丝毫没有动摇凤凰县政府的收费决心。当地旅游局官员称,通票制引发了部分民众的意见,是居民和游客理念还没转变。新浪网的调查显示,逾九成参与投票的网友表示,古城收费让人望而却步,将不会去凤凰旅游。凤凰县政府则表示,正在对实行门票收费后的影响作进一步的调查,如有变动会在近期答复。希望凤凰县政府能够正视舆论的质疑,从为民造福而非与民争利的立场出发,认真评估古城收费政策对古城居民、古城发展以及当地政府形象的利弊影响,静下心来思索:政府的职责是什么?究竟谁该转变理念?

新京报 “天梯上学路”让人难以接受

在湖南桑植县张家湾村,因地高多悬崖,从村民的祖辈起,村民就靠搭在高低两处的木梯出入镇上。而村里学龄期的孩子,也只能靠爬垂直的天梯上学,而梯子下面,就是六七十米深的深渊。事实上,当地为解决村民出行难题,做过几种尝试:修路——悬崖峭壁工程量巨大,“3000万都未必能修成”,而村里人口又不多;移民——山里丰富资源,成了村民生计来源,他们舍不得离开;在村里建学校——会让别的地方的孩子翻山越岭,且教育质量不好到哪儿去。即便如此,当地政府仍难逃不作为的嫌疑:在媒体报道后,桑植县政府立马表态,先出资金在天梯处改造一条简易通道上山。可假若媒体没曝光呢?当地会不会继续不管?为什么非得等到“媒体曝光”,才将改造简易通道提上日程?

人民日报 尽心呵护公众对法治的信仰

“我还要上诉。”日前,“上访妈妈”唐慧诉永州市劳教委案被一审驳回,走出法庭之后,她掩面而泣,说出了自己的心愿。无独有偶,浙江杭州强奸冤案当事人张高平出狱后,表达了相似的心迹:我这十年吃尽了苦头,流干了眼泪,但是我的心没死。我始终坚信法律是公正的。卢梭说过,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,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,也不是刻在铜表上,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。小到文明过马路,大到依法治国,法治的根基在于公民发自内心的拥护,法治的伟力源于公民出自真诚的信仰。唐慧和张高平这些普通公民对法律的敬畏和坚持,正是我们建设法治中国最可贵的民意资源。

公民声音

“门难辨”折射出的何止是心虚

□欧阳崧(媒体人)

广西柳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领导办公楼,8个房间牌子上一律只标“办公室”,6个局领导的办公室隐藏其中。来办事的群众说,这简直就是“迷魂阵”。(4月15日《新京报》)



沈海涛图

先被“中国式保安”拦截,4月6日,村民李玲枝到禹州市政府反映情况,被保安拽住甩出门外摔伤。后有门牌“迷魂阵”:柳江县住建局领导门牌一律只标“办公室”,用这些方式和民众“躲猫猫”,折射出的何止是一些官员的心虚?

这些官员千方百计谋“躲藏”,软硬兼施只为远离民众。从

报道中可知,这些领导如此这般躲躲藏藏,是怕前来自访、办事的民众添麻烦;村民李玲枝上访是为讨说法,领导选择性逃避;而柳江县住建局不愿面对民众常态诉求,更是不愿意和民众好好谈,更是习惯性躲藏。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处理不好还会惹祸上身”,这是部分官员的为官之道,岂知

城市话题

“上海式排队”值得学习

□邓闯(职员)

上海向来是排队的“圣地”。以前,计划经济年代,物资短缺,到处排队,人人练就一身排队的好功夫;如今,消费时代,不怕没东西,就怕你不掏钱,居然,上海仍有排队盛况。(4月15日《新闻晚报》)

无论购物还是办事,遇到排队队长龙,绝大多数上海人都会选择自觉地排队,这点让很多初到上海的人都会由衷地感到敬佩。上海人这种在排队方面的自律精神也已感染到很多在上海工作、学习的外地人。

虽说“上海式排队”现象的产生有一定历史因素,但这种象征着城市文明的良好习惯的传承,需要社会形成一种自律的氛围,需要社会形成一种积极的力

量能够更好地传承下去。相比较而言,很多城市也不缺乏形成排队的历史因素,比如,计划经济年代的物资短缺,这种情况当时全国是大致相同的,但很多城市的自觉排队现象延续得就不是那么好。

经历过世博会之后,上海在自觉排队这方面显得更加成熟,这种城市文明已经深深影响到了生活在上海的每个人。其实,“上海式排队”不应仅仅成为一

个城市文明的象征,而应该成为我们每个城市学习的榜样。当哪天“上海式排队”在很多地方都已见怪不怪了,它也就不会被称为“上海式排队”了。

自觉排队,需要每个人的自律,当你积极参与了,当你自觉遵守了,你的内心就会少了排队的辛苦,少了很多抱怨;当每个人都自觉养成良好习惯的时候,排队的效率就会提高,社会秩序就会显得和谐。

河南省报纸新闻名专栏

“逢提必疑”倒逼公平公正选人用人

□陈国琴(市民)

日前,网络上一则“温州泰顺24岁年轻女干部任副镇长”的帖子,引发公众关注。帖子称:“90后副镇长上山!18岁参加工作,不知何时提任副科高级,现转任实职副镇长,年仅24岁。”网帖上所说的这名女干部叫王珊珊,网帖普遍认为她有背景,干部选拔有暗箱操作嫌疑。4月14日,记者就此事进行采访,泰顺县委组织部回应,王珊珊此次任职考察正常,而记者也采访到了王珊珊本人,她说:“希望不要以

年论英雄”

(4月15日中国江苏网) 面对24岁年轻女干部任副镇长引发的质疑,尽管当地组织部门声称任职考察正常,她本人也希望公众不要以年龄论英雄……但是,如此解释显然无法厘清公众心头的疑云。而通过公众的质疑,也再次反映出年轻干部公正地提拔任用干部,最能体现党和政府的诚信与威望。然而,近年来,一些地区在干部提拔任

用过程中,屡屡出现破坏公平正义的各类“歪风邪气”。

这其中,一些“官二代”、“富二代”等有着特殊背景的年轻干部,总能突破用人制度的规范与约束,从而也破坏了公平正义的选人用人环境,更在社会上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。也正是由于正规的用人制度频频受到“冒犯”,正是由于一些不良风气影响了公平公正的选人用人环境,才会出现“逢提必疑”的现实状况。

无论如何,面对当下公众对于年轻干部“逢提必疑”的心态,亟待对当下选人用人制度进行严格监管,从而确保选人用人做到公平公正、阳光透明!

